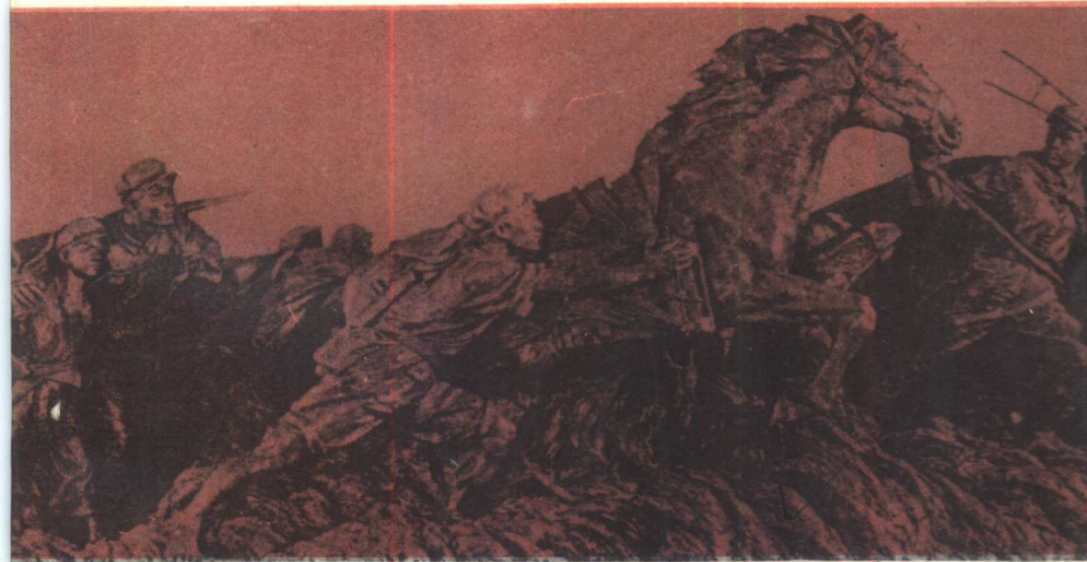


紅軍時期參謀工作 紀實

呂黎平 著



軍事文出版社

红军时期参谋工作纪实

吕黎平 著

军事谊文出版社

(京)新登字: 121 号

书 名: 红军时期参谋工作纪实

著 者: 吕黎平

出版发行者: 军事谊文出版社

(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一号)(邮编 100011)

印刷者: 陆军参谋学院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版 次: 1995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 1995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 张: 8. 43

字 数: 210 千字

印 数: 1—7000 册

书 号: ISBN7-80027-836-0/E·226

定 价: 10 元



原名吕继熙,1917年出生于江西兴国县贫农家庭。1931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历任乡、区、县少年先锋队队长,少共区、县委委员。1932年5月入工农红军学校学习,同年7月转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任红军学校政治部青年干事、校部机要秘书。1933年任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第一局作战参谋。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四、五次反“围剿”战争。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副科长。1936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

河,任西路军总指挥部情报科科长。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随余部进入祁连山打游击,后由党中央代表陈云接入新疆,在迪化(今乌鲁木齐)任西路军总队干部队支部书记。1938年2月由党中央派入新疆航空队学飞行,任飞行班班长、支部书记。1942年4月毕业,成为我党培养的第一代飞行员。同年9月被国民党新疆督办盛世才集体逮捕入狱。1946年6月由党中央营救集体获释,于7月回到延安。同年9月由中央军委派往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工作。从1947年起,任航空学校飞行教员队队

长、训练处处长。1948年参加辽沈战役,任沈阳军管会航空处处长。1949年参加平津、渡江战役,任南京军管会空军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空军第四航空学校校长,空军指挥员训练班班主任,空军高级航空学校校长,空军第一军军长,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顾问。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8年参加福建前线空军对敌斗争。1961年晋升为少将。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著有《青春的步履》、《星光照西陲》、《通天之路》等。



作者 1980 年与中革
军委总参谋部第一任
部长(参谋长)叶剑英
合影。



1991年作者与南昌起义参加者、后任红军第二方面军副总指挥肖克合影。



1990年作者与张震看望曾任红军总司令部直属队政治指导员的康克清时合影。



1990年作者与
1933—1934年在总
部当李德翻译、长征
后期任陕甘支队作战
科(局)长的伍修权合
影。

1991年,红军总司令
部一局两位健在的
作战参谋孔石苏(孔
石泉,右)与吕继熙
(吕黎平)合影。





1933 年 5 月至 1934 年 8 月中革军委与总司令部首长在瑞金县沙洲坝乌石龙村办公的旧址,作者在此加入参谋队伍。

瑞金县梅坑——1934 年 10 月 10 日,党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战略大转移(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起点。





遵义会议纪念馆——1935年1月，红一方面军长征到遵义，党中央在此楼上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迭部县腊子口——红一、二、四方面军于1935年9月——1936年8月，北上经过战斗的险境。





陕西吴起镇——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率领红一、三军团及军委纵队（陕甘支队）长征二万五千里
的终点。



会宁城——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纪念塔。

苦算明方是精技習藝佐命
而不辱命

解於戰爭作於漢口 書贈

呂黎平 辛未冬月 蕭文

貴社多謀

帷幄有素規誦武修之參謀

1911/02

前 言

历史，犹如前人筑成的一座山峰，大家都可以攀登。但是，站在不同的侧面，在不同的时期，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就会发现不同的内容。它们互相补充，丰富充实，形成历史的全貌。当然，如果用不同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就会产生不同的看法，有的会形成错觉，甚至得出完全违背历史真实的结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应力求全面地观察历史，认识它的本来面貌，决不能随意夸大或缩小，更不允许歪曲和篡改历史。

这里回顾的是1927——1937年间中国工农红军，主要是第一方面军参谋工作的产生、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从南昌起义的参谋团到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会合之后，红军参谋工作的沿革。因为第二方面军的第六军团、第三十二军（原红九军团）均属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又随第四方面军行动一年多时间，第一、第四方面军的参谋人员又有交流，因此，三个方面军的参谋工作体制编制与方法基本相同。参谋工作的历史是中国工农红军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上1934年10月从瑞金战略大转移时起到1935年8月的总司令部，以及同年9月党中央率领军委纵队和红一、三军团北上直到陕西北部苏区的红一方面军司令部，都是党中央的办事机关，记录了长征时期党中央活动的史料。在这一年多时间里，这两个司令部的军事工作又给中共中央的党史提供了历史资料。

红军参谋工作的历史，如同其他历史一样，是以往事实的记录，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它不是小说，不是天方夜谭式的神话故事。

63年前，我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时候，便知道军队是由指挥员（首长、统帅）、部队（战斗实体）和机关（统帅部、领率机关——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与卫生部等）组织而成的。指挥员（军事首长、政治委员）随司令部行动，司令部是军队的统帅机关，编制有不同职能的机构与各类参谋人员，协助指挥员指挥军事行动。

军队的这种组织系统，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形成的。在我国，早在22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雏形，1976年在西安发掘的秦始皇陵第三号俑坑就是明证：春秋战国之前的战争，指挥员要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要位于士伍之前，亲自发出口令，指挥战斗；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作战方式的变化，指挥员的位置从前面移至军中，依靠参谋人员帮助指挥；到了秦代，战争规模进一步升级，范围扩大，军事技术亦有了发展，便在军中单独组织了指挥部。秦陵第三号俑坑，就是独立的指挥部（幕府）。随着社会生产力与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指挥体系亦在不断地进步与完善。

外国军队，从作战实践中亦总结出了与我国军队基本相同的指挥系统，但时间要晚得多。刘伯承在论述军队指挥的演进时，把它分为三个时期。拿破仑时代，他还亲自以口令指挥战斗。也就是类似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的战斗指挥程式。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现代高科学技术、新式尖端武器广泛装备于军队和应用于战争中，其组织指挥系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与完善。

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高首长（统帅），就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主席、全国红军总司令、总政治委员。领率机关（统帅部）就是红军总司令部（参谋部）——中革军委的军事行政机关（以下简称总部）、总政治部、总供给部、总卫生部。

总参谋长，既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参谋长，又是总司令部（总参谋部）的直接首长。

红军的各级司令部，是各部队指挥作战的中枢，肩负着辅助各级首长决策与指挥的重任。

由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与组织的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武装部队和秋收起义的武装部队会师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是一支历尽坎坷的英雄军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她有过极为辉煌的岁月，也有过极为艰难的时期，她还经历了举世无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她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大到小、又由小到大的曲折发展过程。正是由于经过这样曲折历程的考验，为我党我军保存了骨干力量，培养了身经百战的数以千计的干部。据统计，仅团以上干部就有 1700 余人，为中国革命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为我军后来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传奇般的英雄经历是与党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的直接领导密切相关的。众所周知，党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是全国一切红军部队的领导机关和统帅部，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构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党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一直与第一方面军共同行动。同时，党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的主要首长又都是红一方面军的军政首长。这样，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及其参谋工作就具有了更为突出的特点：

首先，党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既是全国红军战略方针的制定者，又是红一方面军具体军事行动的决策者。红一方面军始终处于党中央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之下，虽历经波折但终能转危为安，取得胜利。另一方面，在其发展历程上也更多地直接受到了王明、博古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损害和干扰。朱德、毛泽东是我军的缔造者，也是红一方面军的创始人，历史的经验证明，每当朱德、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受到排斥，红一方面军就会

遭受失败和损失，有了朱德、毛泽东的正确领导，红一方面军就能不断取得胜利。因此，研究红一方面军参谋工作的历史，不能不了解党的历史和我军的奋斗史。离开了党和红军的历史，红一方面军的参谋工作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次，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建设的历程是红军时期我军司令部建设历程的集中反映。从南昌起义开始，党就十分重视我军的司令部建设。南昌起义时，党就在起义部队建立了我军的第一个军事指挥机关——军事参谋团。此后，经过井冈山时期和四次军事反“围剿”，红一方面军在总结军事斗争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司令部机构。1933年5月，叶剑英受命组建中革军委总司令部时，又在总结我军参谋工作经验和吸收苏联红军参谋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在总司令部建立了六个职能局，从而开创了有中国工农红军特点的参谋工作局面。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后，总司令部机构有所精简，但基本上仍然保留了主要的职能部门，既适应了形势的需要，又发挥了司令部组织指挥军事行动的作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抗战爆发以后，为我军组建八路军指挥机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直到建国以后我军的总参谋部，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充实与发展起来的。

第三，红一方面军的参谋工作同其他方面军的参谋工作一样，具有受制性、严肃性和多样性三大特点。所谓参谋，即参与指挥与谋划军队行动，也就是通常说的为首长出谋划策。参谋人员要具备有计有谋、会出点子的素质，这是古今中外参谋工作的共性。但是，对红军参谋人员来说，他们不仅需要有计谋，更重要的是需要有坚强的党性。红军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红军的参谋工作必须受制于党中央、中革军委的指导和决策。红军参谋工作的这一特性是由红军的三大任务——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而决定的。所以，在红军中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工作机关

——政治部，物质保障机关——供给部、卫生部、兵站等（后来又改称为后勤部），故工作队、生产队的任务分别由各级政治、后勤部门主管。司令部主管军事工作，主要是作战、情报、通信、训练与行政管理等。当然，这三个部门都是在各级党委和军事、政治首长统一领导下发号施令的权威机关。它们相互之间既有分工，各司其职，又要密切配合，协调一致。同时，中国工农红军的各级军事指挥员与政治委员（教导员、指导员）同为部队的首长。红军既非只担负作战使命，也不实行一长制，这就决定了参谋机关必须有党的组织，参谋工作必须围绕红军的三大任务而进行活动与协调，必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参谋工作，是在党的领导下，从组织指挥军队进行战斗的实践中、从管理与训练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一门军事科学。在党中央、中革军委直接领导下的红军总司令部，既担负了对全国红军的全面领导，又担负了对红一方面军的直接作战指挥，因此，红军总司令部的参谋工作就势必带有显著的严肃性，就是说总部对参谋人员在政治上、业务上都有很高的要求。敌我形势把握不准，容易造成全国各红军部队战场失利；核心机密的保密工作没做好，会犯不可饶恕的政治错误；一个作战命令不按规格写准确、写清楚，就可能贻误战机；一个情报搞错了，可以导致战役失败；训练不严与管理不力，就不能提高战斗力。正因为如此，中革军委与总部首长对红军参谋工作非常重视。凡属重大问题，都要亲自过问，取得第一手材料，及时定下决心，作出决策；同时又要求参谋机关按职责行事，由分管的职能部门处理经常性工作，以起到组织军队建设与辅助首长指挥的作用。中革军委首长这种面对面、一竿子插到底，又放手让职能部门大胆工作的领导方法，一直沿袭到建国以后的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其间许多重要指示与作战命令，由先后担任中革军委主席的朱德、毛泽东亲笔写成。

由于红军总司令部同时实施对全国红军与红一方面军的指

挥，参谋工作还具有适应各种情况的多样性。为此，总司令部曾在一段时间里在六个职能局中设立近 20 个科来分管各项参谋工作。由于分工具体，各科参谋人员团结协作，较好地完成了总部首长布置的协助作战指挥、负责译电机要业务、侦悉敌情、保障供给以及教育训练等多项任务。同时，由于战事频繁，红军各部队司令部也经常调整和安排一些新的参谋业务内容。这种一部多科、一人多能的现象是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下参谋工作的必然要求，它大大提高了红军司令部工作的效率，适应了红军发展的需要。

二

笔者有幸，自从 1932 年 5 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以后，曾先后在叶剑英、刘伯承、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徐向前等我军第一代领导人身边工作，并与中央红军的参谋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我直接参与了红一方面军的多次军事行动，亲身经历了红一方面军历经波折的艰难历程，并做过黎平、遵义及两河口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服务工作，对红军总司令部的建设与参谋工作均有一些亲身感受和了解。但是，迄今为止，在笔者阅读过的军史、战史读物中，尚未看到有关红军参谋工作的专门章节和专著。有鉴于此，作为中革军委总部一名幸存的参谋工作者，我感到有责任也有必要把十年内战时期耳闻目睹的一些红军参谋工作情况整理出来，提供给全军参谋人员以及党史、军史学界的同志们借鉴参考，起一点承先启后的作用。

笔者写这本书，是按以下原则落笔的：

一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就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叙述和探讨问题。为了完整地揭示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参谋工作的历史过程，本书从南昌起义的军事参谋团的活动写起，对五次反“围剿”时期